

浦江魂

——白色恐怖下的周恩来

成立特科
敌营三杰
神秘牧师
伍豪事件



浦 江 魂

——白色恐怖下的周恩来

王光远 著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浦江魂：白色恐怖下的周恩来/王光远著. —北京：中央文献出版社，1999. 7

ISBN 7-5073-0587-2

I. 浦… II. 王… III. 周恩来-生平事迹-1927~1931
N. K82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22028 号

浦江魂

——白色恐怖下的周恩来

著 者/王光远
责任编辑/张 宁
封面设计/张 戈
版式设计/郑 刚

出版发行/中央文献出版社
地 址/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
邮 编/100017
销售热线/63097018
经 销/新华书店
排 版/北京地质印刷厂
印 刷/北京安泰印刷厂
装 订/广增装订厂

850×1168mm 32 开 8 印张 180 千字
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5000 册

ISBN 7-5073-0587-2/K · 243 定价：15.00 元

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前 言

1927年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，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，在国民党严密统治下的上海，坚持了四年多的地下斗争。当时由于蒋介石实行清党反共，全国充满了白色恐怖，环境险恶，危机四伏。这一时期，在中共党内也出现了瞿秋白、李立三、王明三次“左”倾路线的错误，发生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的叛变事件。在这复杂的环境之中，周恩来与敌人斗智斗勇，历尽艰辛。

本书以详实的史料为根据，概述了周恩来领导情报工作、军事工作、组织工作、通讯工作、档案工作的情况，以及处理中共党内复杂矛盾的经过。

本书如有不妥之处，敬请读者指正。

目 录

前 言

一 重返上海 [1]

大革命失败后，周恩来领导了“八一”南昌起义，并率领起义军南下潮汕，带病主持了前敌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——流沙会议。在莲花山地区陷入困境，经杨石魂营救脱险。后去香港养病。1927年11月，奉命重返上海，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地下斗争生活。

二 制止盲动 [7]

1927年底，出现了瞿秋白的第一次“左”倾错误，否认革命已转入低潮，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。周恩来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，制止了浙江、江苏、湖北、福建、云南等地的盲目暴动，并妥善地处理了广州暴动的善后问题，使党避免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。

三 大连遇险 [15]

1928年4月，周恩来、邓颖超夫妇奉命去苏联出席中共“六大”，途经大连时，被日本水上警

察厅扣留。周恩来沉着机智，巧妙应对，终于化险为夷，平安抵达莫斯科。

四 出席“六大” [21]

周恩来是“六大”主席团成员兼大会秘书长，在会上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和军事报告，正确地分析了革命的形势和革命的性质，论述了红军的任务和建军原则，充分显示了他的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。他被大会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。

五 平反假案 [27]

“六大”结束后，周恩来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，并当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。在莫斯科停留期间，他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，实事求是地纠正了王明等人制造的“江浙同乡会”的假案，得到广大留学生的爱戴和拥护。

六 成立特科 [33]

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，为了保卫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，为了党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，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，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党的政治保卫机关“中央特别委员会”（简称中央特科），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。

七 红色管家 [39]

中央特科的第一科是总务科，主要任务是设立机关，建立联络点，并负责租房子、找铺保、采买物资、保存武器、布置会场等，是党中央的得力助手。在周恩来等人的直接领导下，做了

大量的工作，被誉为革命的“红色管家”。

八 情报科长 [46]

中央特科的第二科是情报科，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，掌握敌情，肃奸反特，保卫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。陈赓化名王庸，出任情报科长，战斗在龙潭虎穴之中，留下了不少为后人传诵的英雄故事。

九 奇人杨登瀛 [52]

杨登瀛是国民党中央驻上海特派员，也是中央特科的一个秘密联络人，地位显赫。他利用职务之便，为我党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，营救过任弼时、关向应等中共领导人，并几次帮我们查清叛徒，消除隐患。有人说他是“中统的异端”，有人说他是“隐蔽战线的奇人”。

十 敌营三杰 [59]

根据周恩来把国民党特务机关“拿过来”的指示，中央特科选派最机智、勇敢、忠实、可靠的钱壮飞、李克农、胡底三人，打进中统特务组织的核心要害部门。他们为保卫党中央做出了杰出的贡献，被称为“敌营三杰”。

十一 神秘牧师 [66]

中央特科有一位以“牧师”为职业的共产党员董健吾，他利用各种关系，设立秘密联络点，搜集情报。并开办了“大同幼稚院”，收养了毛泽东、李立三等领导人和彭湃、恽代英等烈士的遗孤，为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。

十二 四号密查员 [72]

遵照周恩来和陈赓的指示，共产党员宋启华打入警备司令部，出任政治密查员。他多次帮助中央特科查清叛徒，设计锄奸，并营救被捕同志，做出重大贡献。他成为陈赓的好友。

十三 “打狗队” [77]

中央特科第三科是行动科，主要任务是武装保卫党中央、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的安全；打击特务，镇压叛徒、内奸；武装营救被捕领导人。他们神出鬼没，使敌人闻风丧胆。我们叫它“红色恐怖队”或“红队”，群众叫它“打狗队”。

十四 地下电波 [83]

中央特科的第四科是通讯科，主要任务是负责党中央与各地的通讯联络，成立较晚。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，李强等人克服重重困难，自己制造出第一部无线电台，并培养了一批电讯人才，为党的电讯事业奠定了基础。

十五 革命三剑客 [89]

交通工作是党不可缺少的“血脉通道”。在周恩来的领导下，成立了中央交通局，主要任务是传递党的各级组织之间相互往来的文件，护送党的干部，运送特别物资和党的经费。在上海活跃着一批女交通员，夏之栩、陶恒馥、葛琴三人被称为“革命三剑客”。

十六 秘密交通线 [95]

为了沟通党中央与各地的联系，先后建立了党与北方局、南方局、长江局的秘密交通线，设

立了大小交通站。后又建立了上海与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，蜿蜒数千里，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工作在这条秘密交通线上。

十七 整顿顺直省委 [102]

大革命失败后，顺直省委（北方局）内部出现了组织涣散、思想混乱、派别纠纷不断的局面，严重影响了革命工作的开展。虽经几次整顿，仍未见好转。1928年底，周恩来奉命来到天津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说服工作，改组了省委领导，使北方的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。

十八 革命伴侣 [108]

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五四运动中相识的，因共同的革命理想结合成亲密的伴侣。大革命失败后，在陈铁军的帮助下，邓颖超逃离了广州。在上海期间，邓颖超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，二人生活、战斗在一起。

十九 中央直属支部 [116]

邓颖超是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书记，领导中直机关工作，创办了《支部生活》杂志。周恩来对“直支”的工作十分关心，几次出席“直支”会议，并为《支部生活》撰稿。

二十 彭湃牺牲 [123]

1929年8月，周恩来的亲密战友、中央农委书记彭湃、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人，因叛徒出卖而被捕。周恩来领导陈赓等人曾积极进行营救，未能成功。彭湃、杨殷、颜昌颐、邢士贞等四人惨遭敌人杀害。

二一 巧惩叛徒 [130]

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的同志，经过周密的调查和精心的安排，查清了叛徒白鑫的底细，设计将叛徒处决。伸张了革命的正气，震慑了敌人。

二二 培训干部 [135]

周恩来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。他不但对干部有严格的要求，而且十分关心干部的培养。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，多次开办干部训练班，周恩来亲自授课，大大提高了干部的素质。

二三 领导军事 [141]

周恩来是我党最早的军事工作领导人之一，在上海期间，仍主持全党的军事工作，为各革命根据地选派干部，输送物资，使工农红军得到迅速的发展。

二四 请回毛泽东 [147]

在中央革命根据地，因内部矛盾，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。陈毅去上海汇报工作，和周恩来一起起草了中央“九月来信”，周恩来要他回去后立即请回毛泽东。

二五 反托派斗争 [154]

二十年代末，在中国出现了“我们的话派”、“无产者派”、“十月社”、“战斗社”等托派组织，他们以上海为中心展开活动。周恩来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反托派斗争。陈独秀因坚持托派立场，被开除党籍。

二六 再去苏联 [162]

为了解决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矛盾，

处理好与李立三之间的意见分歧，纠正李立三的“左”倾错误，周恩来再次去苏联，向共产国际汇报和请示工作。

二七 立三路线 [169]

1930年，出现了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“左”倾错误，组织全国性的武装暴动，给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失。周恩来和瞿秋白奉命回国，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，制止并纠正了立三路线。

二八 四中全会 [176]

王明等人回国后，兴风作浪，大搞派别活动，又在米夫支持下，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，根本否定了三中全会，周恩来被迫作了检讨。王明等人上台后，开始了第三次“左”倾路线对全党的统治。

二九 保护档案 [184]

周恩来对档案工作也十分重视，和瞿秋白一起制定了党的第一个《文件处置办法》。陈为人为了保护中央档案，呕心沥血，不避艰辛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

三十 顾顺章叛变 [192]

原中央特科的领导人顾顺章，目无组织，贪图享受，在武汉被捕后，叛变投敌，阴谋将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。钱壮飞得到这一情报后，连夜奔赴上海，向中央作了汇报。

三一 谈笑破敌 [199]

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后，连夜进行了部署，决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立即转移，停

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。使敌人的阴谋计划落空，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。

三二 向忠发被捕 [202]

原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，不听周恩来的劝告，因贪恋女色，在上海被捕后叛变，致使党的一些机关遭到破坏。向忠发还亲自带人去逮捕周恩来，周恩来侥幸脱险，向忠发却被蒋介石下令枪决。

三三 撤往苏区 [208]

顾顺章、向忠发叛变后，敌人悬出重赏，加紧了对周恩来的搜捕。这时，党中央已陆续迁往中央苏区，为了加强对苏区工作的领导，周恩来也奉命撤往中央苏区，开始了新的战斗。

三四 伍豪事件 [214]

周恩来撤离上海后，敌人狗急跳墙，在报端伪造了一个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》，妄图挑拨离间，破坏我党的团结，并对周恩来个人进行诋毁。上海地下党利用种种手段，给敌人以回击，揭穿了敌人的阴谋，这就是轰动一时的“伍豪事件”。

三五 光照千秋 [220]
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反革命集团，利用所谓的“伍豪事件”，妄图打倒周恩来，实现其夺权美梦。周恩来在重病缠身的情情况下，与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斗争，使真相大白于天下。周恩来的英名将万古流芳。

一 重返上海

大革命失败后，周恩来领导了“八一”南昌起义，并率领起义军南下潮汕，带病主持了前敌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——潮汕会议。在莲花山地区陷入困境，经杨石魂营救脱险。后去香港养病。1927年11月奉命重返上海，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地下斗争生活。

1927年夏，由于蒋介石、汪精卫先后叛变了革命，实行清党反共，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，生气勃勃的大革命遭到失败。此后，内战代替了团结，独裁代替了民主，成千成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了血泊之中，整个中华大地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。但是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、被征服、被杀绝。他们从地上爬起来，揩干净身上的血迹，掩埋好同伴的尸体，他们又继续战斗了。

周恩来是1926年冬由广州来到上海的。他亲自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，解放了上海。蒋介石制造“四一二”政变，在上海进行血腥屠杀，周恩来幸免于难，由上海去了武汉。汪精卫叛变前夕，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提出辞职，经共产国际批准，成立了由周恩来、张国焘、张太雷、李立三、李维汉五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。7月下旬，周恩来奉中央之命，出任前敌委员会书记，同叶挺、贺龙、朱德、刘伯承等人一起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“八一”南昌起义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第一枪。

南昌起义后，周恩来等人率军南下，经过江西会昌大捷，于9月24日占领了广东汕头、潮州。26日，中共中央派张太雷陪同

第三国际一名代表赶到汕头，传达“八七会议”的精神及中央对起义军的指示：（一）取消南昌起义时所用的“国民党革命委员会”的名义，改为苏维埃；（二）起义军尽可能地收集整顿，开往海陆丰，与当地农民武装会合，组织工农革命军，准备长期斗争；（三）起义军的一切善后事宜留下周恩来负责，其他领导人迅速转移，由当地农会会员在沿海秘密找船，赴香港待命。因当时敌情严重，未能细致讨论。28日，敌军开始向汕头进攻，前委决定放弃汕头，向普宁和海陆丰撤退。10月2日，连日苦战的起义军来到了普宁县的流沙。

流沙是个不大的村落，只有一条小街，几十户人家，连一个集镇都算不上。10月3日，周恩来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，出席的有叶挺、贺龙、李立三、恽代英、彭湃、刘伯承、谭平山、聂荣臻、郭沫若等二三十人。会议是在天后庙（后改为基督教堂）的一个细长的侧厅里举行的，房间不大，有的人只好靠墙站着。这时，周恩来正患恶性疟疾，发着高烧，是用担架抬来的。他脸色铁青，但目光炯炯。郭沫若回忆说：“主要是恩来作报告，他是在发着疟疾的，脸色显得碧青。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，简单地检讨了一下。……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，我们的情报太疏忽，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。……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，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。……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。……把这些失败因素检讨了之后，接着又提到大体上已经决定的善后办法——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，向海陆丰撤退，今后要做长期的革命斗争。这工作已经做得略有头绪了。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，不愿留的就地分散。已经物色好了好些当地的农会会友做向导，分别向海口撤退，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。”周恩来报告后，叶挺愤慨地说：“我们再有得一团人，便什么都不成问题的啦。到了今天，只好当流寇（指打游击），还有什么好说。”贺龙也不服

他说：“我不甘心，我要干到底。就让我回到湘西，我要卷土重来。”

会议开到下午2时左右，因村外山头上发现了敌人的尖兵，会议只好匆忙结束。周恩来仍坚持与一些分散的干部谈话，别人看他病成这个样子，都劝他先走，他坚定地表示：“我的病不要紧，能支持得住。我不能脱离部队，准备到海陆丰去，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。你们快走吧。”部队按原定计划，出流沙向西经过钟潭向海陆丰的云落前进。周恩来由担架抬着，走在队伍的最后边。

这次流沙会议是南昌起义军的最后一次会议，是很有意义的。30年代，上海左联出版过一种叫《流沙》的刊物，就是为了纪念这次会议。

部队离开流沙后，因大路已被敌军封锁，只能沿着乡间小路走。大约向西南走了5公里，来到池尾莲花山地区，这里地势险要，三面环山，部队突然受到陈济棠主力的冲击，被拦腰切断。起义军已经疲惫不堪，又在新败之余，军心动摇，突遭袭击，部队渐渐失去控制，陷于混乱，很快被冲散了。周恩来时而清醒，时而昏迷，仍不断高喊着：“冲啊！冲啊！”混乱中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也不知跑到了何处，留在他身边的只有叶挺和聂荣臻二人，他们道路不熟，又不懂当地话，三个人只有叶挺有一支小手枪，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。这一地区地主组织的民团又十分猖獗，他们配合国民党主力军，正在四处抓人。据查在起义军中担任连长的林彪，曾携款开了小差，因怕民团抓住杀头，才又跑了回来。

“天无绝人之路”，正当周恩来等人在途中陷入困境之时，却遇见了中共汕头市委书记、也是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。

杨石魂是普宁钟堂乡人，1902年生，“五四”运动时是岭东地区学生运动的领袖，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，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任汕头市总工会筹备会主席。1926年初，第二次东征陈炯明胜利后，周恩来出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，3月，他主持召

开了潮、梅、海陆丰地区第二次代表大会，杨石魂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。国民党改组后，杨石魂任汕头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、中共汕头地委委员，在周恩来领导下共事一段时间。后曾被国民党右派逮捕，营救出来后任中共汕头市委书记。起义军来到汕头，他奉命配合起义军行动。

杨石魂见到周恩来等人后，立即将他背到一个村子里，做了安置，并通过秘密交通站给陆丰县南塘区区委书记黄秀文送去一信，内称：“我陪同两位负责同志来到南塘，拟在金厢雇船去香港，希望设法完成护卫任务。”第二天中午，又送去一信，要他派可靠的党员，晚9时到琐城岭来接，必须严密封锁消息，做好警卫工作。黄秀文按时派李秀等人前来，将周恩来抬到他家中，由他父亲负责照料。因周恩来病重，一时难以动身，城镇又住满敌军，不能前去治病，经与县委联系，决定将周恩来送往群众基础较好的碧溪村隐蔽，那里有一位可靠的中医大夫，可以进行治疗。他们用一乘轿子把周恩来抬去，几天后又回到黄家。这时周恩来一面养病，一面找县委的干部了解农民运动和党团组织恢复的情况。当他得知部分起义军在颜昌颐、董朗带领下已到海陆丰时，非常高兴。

为了周恩来的安全，在养病期间，还曾把他送到南塘圩的兰湖村隐蔽，住在贫农郑阿仲家中。阿仲的老妈妈看他病得厉害，特地煮了绿豆汤为他退烧。周恩来见老人床上只有破烂的被单，就把自己的一条红色毛毯送给老人。临别时，又把自己唯一的一条虎皮毛毯送给了阿仲。这两条毛毯，阿仲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以后。

十多天后，黄秀文找来一条小船，送周恩来等人去香港。他们用轿子抬周恩来到金厢镇海边的洲渚村，由此上船。临别时，叶挺把自己自卫的小手枪和一副望远镜送给黄秀文做纪念，并嘱咐

他要好好坚持斗争。

聂荣臻回忆说：“那条船，实在太小，真是一叶扁舟。我们四个人——恩来、叶挺、我和杨石魂，再加上船工，把小船挤得满满的。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，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。我们三人和那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。船太小，舱面没多少地方，风浪又大，小船摇晃得厉害，站不稳，甚至也坐不稳，我就用绳子拴到桅杆上，以免被晃到海里去。这段行程相当艰难，在茫茫大海中颠簸了两天一夜，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。”

船到香港后，周恩来病情仍无好转，由杨石魂背他下船，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一个住所住下，对外说是姓李的商人，来香港治病，杨石魂是李先生的弟弟，负责照料一切。10月25日，周恩来在皇后饭店召集已到香港的起义军领导人叶挺、贺龙、林伯渠、吴玉章、恽代英等人开会，研究如何去上海。大家一致的意见，根据他的病情，必须留下来养病。广东省委决定派范桂霞来照看他。范桂霞原是广东中山大学附属师范的学生、青年团员，父亲是位医生，清党时被杀，她还参加过何香凝主持的护士训练班学习，由她负责护理，同时请医生治疗。

不久，周恩来被转移到荷里活道的一间木楼上。他平易近人，经常同这里的木工们亲切交谈，了解他们的疾苦。解放后，人们从报纸上看到他的照片，才知道当年在木楼上养病的那个人，原来就是我们国家的总理。一次，周恩来在接见香港赴京参加观礼活动的联合会会长陈旭才时，还询问小木楼还在不在，并请他向当年住在小木楼里的木工，转达他对他们的问候。

周恩来在养病期间，还出席过南方局研究广州暴动的会议。南方局是8月11日由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，主管广东、广西、闽南及南洋一带的党务。由周恩来、张国焘、张太雷、彭湃、恽代英、陈权、黄平等人组成，张国焘任书记，周恩来任军事委员会主任，